

# 方闻教授对中国艺术史学界的贡献

陈葆真

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些说法；所以他训练学生的方法是要他们自励自强，主动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他的这种方法逼使学生面对严苛的挑战，在绝境中设法突破自我的限制，借以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独立去解决困难后，对自己产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从他学习过的学生，都有过这类难忘而令人感激的经验与领悟。

1948年，一个18岁的青年，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上海，远赴当时全世界最富强的美国，面对他不可预测的将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中，他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不懈的奋斗和对推展中国艺术研究的强烈使命感，在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美国，与来自全世界的菁英互相竞争，终于在艺术史学界与博物馆界脱颖而出，打开一个新局面，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提升了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西方的能见度。他就是方闻教授。

方先生最先在美国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学与任职，期间共达51年（1948—1999），深耕茁壮，培育人才：本身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枝叶繁茂，他的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在世界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推展亚洲艺术的研究。后来，他又受邀在代表全世界艺术橱窗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担任亚洲艺术部的特别顾问，几近30年（1971—2000），开疆拓土，使它成为馆中最大的部门之一，同时大量收藏、研究和展示亚洲艺术品，助使西方人士了解亚洲艺术的优美和价值。方先生的聪明才智、心胸气魄与胆识毅力都非常人可及。他的奋斗与成就也像传奇一般令人惊叹！但由于方先生的论著多以英文发表，而且，他在学术界与博物馆界的活动也多以美国为主，因此，西方学界对他比较熟悉；但，相对的，中文读者对他的学说与贡献便不尽清楚。到目前为止，他的著作曾译作中文的只有一小部分，包括《心印——中国书画结构与分析研究》《超越再现》《夏山图》和《中国艺术史九讲》等。在后二者之中，北京清华大学谈晟广教授特别为文，简介了方先生的学说，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

虽然方先生已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从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退休，最近也较少参与学界活动，然而，他半



▲1947年《美术年鉴》“方闻”条目

▲幼年方闻5岁时书写照片。附记：“民国廿四年（1935），随双亲赴吉隆坡坤成女校访姨母，适逢该校十周年纪念，奉姨命对客挥毫，有五龄童之称。” 方闻夫妇藏

世纪以来在异国，对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推展所作的贡献之大，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其功厥伟，不容忽视。我于1978年夏天，离开台北故宫博物院，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方先生学；毕业前后，又随方先生工作数年，到1991年春天返回台大教书为止，总计在普大亲聆教诲的时日长达12年半。为时虽久，愧未能窥其学养之堂奥。以下，个人谨据那些年间在普大的见闻，略述方先生的学术背景和见解，以及他在海外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推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之事例。如此以管窥天，难免不全，惟望藉此，与年轻同道分享所知，并向方先生表达个人的感谢和敬意。

## 从上海到普林斯顿大学

方先生（浙江仙居人）出生于1930年的上海，天资颖异，从小便对中国书画具有强烈的感受。他在童年时期，便

从清末著名书家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之侄李健先生（1881—1956）学书、画、古文，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书画方面。方先生年仅10岁左右便曾举行个人书展，轰动了当时的上海书坛而被誉称为神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方先生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曾从王遽常先生（1900—1989）学中国古文。就读一年后，方先生因发现理科与他的志趣不合而离开，改于1948年远赴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研读，主修西洋史和艺术史。

当时普大的西洋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师承德国艺术史大师沃弗林（Heinrich Wölfflin, 1864—1945）的风格分析理论；重要的教授为潘诺夫斯基（Edwin Panofsky, 1892—1968）。1951年，他依规定修完了系中所有艺术史的课程之后，便从大学部毕业，直接进入博士班研读；在学期间曾特别从 Kurt Weitzmann（1904—1993）、Erwin Panofsky、Rensselaer W. Lee（1898—1984）和 George Kubler（1912—1996）等教授学习西方艺术史，此外也从罗力教授

（George Rowley, 1892—1962）研读中国艺术史。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的情况日趋热络。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博物馆界和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的收藏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一些重要博物馆便陆续收集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菲尔德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旧金山的亚洲美术馆、哈佛大学的佛格美术馆、费城的宾州大学美术馆和普大的大学美术馆等等。同时，在许多大学中也产生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和具体的研究成果。

Rowley 教授原来专研14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后来渐对中国山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收藏许多石刻拓本和画作（后来赠予普大美术馆）。方先生是那时 Rowley 教授所收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方先生在中国书画方面独特的能力，受到了 Rowley 教授的重视，不但常与他谈论中国书画的问题，而且在购买中国画时

也常会询问他的意见。这些因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因此日后转而专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方先生才能出众而且十分勤学，因此教授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据当年曾经教过方先生“美学”课程的 Arthur Szathmary 教授（1916—2013）告诉笔者，方先生当学生时十分用功，当周末其他同学都在玩乐时，他却利用时间勤练中国书法，偶尔也作简笔风格的树石画。方先生的这些特质获得了他同届同学艾礼德先生（John B. Elliott, 1928—1997）的信任，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好朋友。John B. Elliott 先生和他的母亲 Mrs. Edward Elliott 女士（Ellen Elliott, 1901—1990）都是富而好礼、修养很好的人，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物的收藏具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母子二人都以“无名氏”的身份支持普大的东亚研究和艺术史研究，同时也是普大美术馆的赞助者和捐赠者。在方先生的协助下，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作品；其中不乏稀世之作，特别是 Elliott 先生所收的书法作品，不论在质与量上都堪称是欧美地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藏。他们过世之后也将大部分的收藏捐给普大美术馆。他们对普大的东亚艺术与文化研究的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以下我们回头来谈方先生的艺术史研究。

## 博士生的名著：《溪山无尽》与《罗汉和天桥》

1951年，方先生从普大大学部毕业后，直攻艺术史博士课程。他在选课、研究之外，也担任大学部的课程助理（preceptor），此外又曾到克利夫兰和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并开始出版重要的学术论著。当时他虽才20多岁，但已是中